

由弱裔出發，進行跨國思考

李歐旋 (Françoise Lionnet)、史書美 著

沈尚玉 譯；蘇 榕 校譯*

摘 要

本文為 2005 年出版的《弱勢族群的跨國主義》的引言，提出所謂「弱勢文化的跨國研究」的概念，主張弱勢文化不應只相對於強勢／主流文化，而應和其它地方的弱勢文化串聯起來，將之納入比較及跨國的範疇。弱勢到弱勢的橫向的關係是轉化性文化實踐的所在，演繹新的文化形式，並將之理論化及歷史化。經由對族裔研究、少數民族論述、區域研究、後殖民研究，以及以殖民語言為中心所組織的各弱勢跨國研究（如法語語系研究、西班牙語語系研究、葡萄牙語語系研究、華語語系研究等）的原則性的批評，本文企圖彰顯當今跨國化境況中的弱勢發聲的複雜性及針對它的方法論的複雜性。

關鍵詞：強勢／主流和弱勢／少數跨國主義，轉化性實踐，根莖結構，弱勢文學，解構主義，歐洲中心的普遍主義，認可政治，分流，道地性，跨殖民主義

* 李歐旋 (Françoise Lionnet)，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語及法語語系研究系、比較文學系合聘教授。

史書美，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系、亞洲語言文化系、以及亞美研究系合聘教授。

沈尚玉，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蘇 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助理教授。

中外文學·第 36 卷·第 2 期·2007 年 6 月。頁 19-49。



Thinking through the Minor, Transnationally

Françoise Lionnet and Shu-mei Shih

Trans. Shang-yu Sheng; Trans. editor: Jung Su^{*}

Abstract

Serving as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volume *Minor Transnationalism* published in 2005, this essay argues for what might be called “minor transnational studies” in which minority cultures from different geopolitical locations are posited in comparative and transnational frameworks vis-à-vis each other rather than always in relation to majority cultures. The minor-to-minor horizontal relationality is seen as a productive locus of transformative cultural practices that theorizes, historicizes, and performs new forms of culture. Situated among ethnic studies, minority discourse, area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those minor transnational studies organized around a particular colonial language (such as Francophone, Hispanophone, Lusophone, and Sinophone studies), this essay makes a principled critique of each of these disciplinary models to better account for the complexity of minority articul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age of transnationalization.

* Françoise Lionnet is professor of French and Francophon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Shu-mei Shih is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nd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Shang-yu Sheng, M.A. Student,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ung S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Keywords: major and minor transnationalism, transformative practice, the rizhome, minor literature, deconstruction, Eurocentric universalism,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branchements, authenticity, transcolonialism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這個合作計畫是在一次因緣際會下構想出來的。那是在 1998 年寒冷陰霾的 11 月，我們不約而同參加在巴黎盧森堡宮舉行的一次會議。這宮殿位於歐洲大國首都，實屬政治重鎮，有著陰暗迴廊及重重戒備，我們因而聊起了「族裔研究」（ethnic studies）在美國及歐洲學術場域的狀況。隨後我們到了咖啡館，一邊喝著熱甜酒（mulled wine），一邊繼續聊著彼此的個人及學術背景、各自的立場和不滿，直到夜幕降臨。我們發現，我們最主要的不滿是在於將個人侷限於自己專業、阻礙彼此對話的學科分界。若我們一直待在原屬研究機構，只會忙著在各自狹隘的學術領域奮鬥，而不可能理解到跨領域合作的可能。一位是法裔模里西斯人，從事法語、非裔、及美非研究；另一位是生於韓國的華裔，從事中文、華語、及亞美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都在法語及中文研究兩大領域裡被「弱裔化」（minoritized）了。從這兩大領域的主流觀點來看，我們都太過傾向「族裔研究」，但雖同樣身為弱勢，平時卻沒有機會分享共同的關懷及處境。若非透過這樣一個在強權都會的偶然會面，共同的弱裔傾向將永遠不為彼此所知。回想起來，才領悟到：過去我們總是垂直向上奮鬥，而忘記左顧右盼，看看那些較不顯而易見的橫向網絡（lateral networks）。

主流強制中介所有形式的文化生產及弱裔社群之間的相互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相遇是病癥性的（symptomatic）。弱裔主體的自我身份認同往往是相對於主控論述（dominant discourse）而建立，而不是與彼此或其他弱裔團體面對面。我們總是研究中心及邊陲，卻很少細看邊陲與邊陲之間的關係。主控者（the dominant）總被認為是一個強大且普遍化的力量，會抹滅甚或吞噬多元的文化特徵，即使對於反抗它的人也是如此。這樣的普遍主義，隱含著若非同化、收編，則為反抗的政治關係，因此設立了一種要求認可（recognition）及公民權的垂直競爭結構。

我們和很多學者相同，都認為普遍主義的理念有所不足，但我們所持的理由卻與位置有關：身為複雜離散主體（diasporic subject），我們在美國佔據著非常獨特的跨國空間。

這樣的普遍主義之一種形式便是法國的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意圖將移民者及弱裔同化為一種特定的「法國特性」（Frenchness）。官方論述中所宣揚的理想「法國特性」，必須透過精通法語和掌握文化符碼（cultural codes）而達成。要成為「法國人」，便是要垂直認同法國之理想形象，而非與同為移民者在「成為法國人」的過程中找尋共同之處。在眾多弱裔團體之間，明顯缺乏相對於彼此的論述，而這正是長期以來殖民意識形態造就的結果：因為強調對立與征服，所以不同族群之間只能形成競爭關係。在其社會及心理認同過程中，弱勢（minor）**看起來**總是經過主流／多數（major）的居中斡旋（mediate）。

全球化之後，橫向及非階序式的網絡結構逐漸取得優勢，這也是德勒茲（Gilles Deleuze）及瓜達希（Félix Guattari）二人所說的根莖結構（rhizome）。根莖結構的概念暗示一種無法掌控的、隱而不顯的象徵地理關係，也是一塊創意地，讓弱裔主體能在其中以一種橫向且多產的方式有所行動和互動。然而即使是這樣具有生產力的理論途徑，德瓜二人仍無法避免落入中心化的模式中，而提出「弱裔文學」。對他們而言，弱裔在文學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建立在其內在於多數也對抗多數的批判功能之上，脫離不了兩者二元對立且垂直的關係：「弱裔文學並不來自弱裔語言；弱裔文學應是弱裔在多數語言之內建構出來的」（16）。

德勒茲及瓜達希、列維納（Emmanuel Levinas）、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等法國哲學家已提供我們思考他者性（otherness）的工具，但這些工具也已常被挪用及去政治化。我們不要忘了一個事實：後結構理論的歷史脈絡和政治脈絡，其實是這些思想家所熟悉的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經驗。德希達

在《論文字學》（*Of Grammatology*）最初幾頁便先提到族裔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一詞，而後才提及今天較為人知的語體中心主義（logocentrism）。但是我們卻很少將德希達解構理論與對族裔中心主義的批判聯想在一起，除了偶然把它當作對差異（difference）和他者性概念的哲學沉思之外。和西蘇（Hélène Cixous）一樣，德希達的個人經驗無可避免影響了他的思想：他是在阿爾及利亞解殖化過程中長大的猶太人。然而，一直要等到法農（Franz Fanon）從加勒比海來到阿爾及利亞，也就是從一個弱裔空間來到另一個弱裔空間，我們才得以見到一位弱裔跨國知識份子，是如何對各地的空間和抗爭進行橫向的連結。

德希達解構理論在 20 世紀中期的歐陸雖然僅佔邊緣位置，但在美國卻是法國理論論述中的支配典範，甚至到了今天，在法國的地位也是一樣。矛盾的是，解構的程序反而強化了歐陸的文哲傳統，使其更加複雜不定，並允許無限的意義戲耍。當批判中心成爲目的本身而非只是手段的時候，中心的地位反而提高了；研究的關注力和重心也依舊放在中心之上。解構主義的「中心／邊緣」（center/margin）關係，看似重視後者，其實只是將其收納控制罷了。「邊緣」或是「他者」依然只是哲學概念或指向未來的期待：他者永遠不會抵達此時此地，他或她永遠是「將來的」（“à venir”）。這種思考途徑所帶出的倫理學意義是重要的，因爲能避開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危險，讓他者免於被物化。然而他者仍然只存在於期待裡，而不構成事實存在。我們更可直言，這種對「將來的」期待，就像是在共和普遍主義下，對「平等」的虛假期待一樣。

相較之下，法農的著作較能夠刺激並強化 60 年代的民權運動，進而協助美國的族裔研究持續發展。法農是首位分析壓迫關係中情感面向的思想家，他也「翻譯」黑格爾或沙特式的異化（alienation）概念，使其能爲國族運動所用。因此，他的作品影

響了許多亞洲、拉丁美洲、及非洲國家的解放運動和弱裔抗爭，而這類抗爭通常是為了爭取國族或文化自主性，及種族平等。在美國，這類的抗爭已讓人不得不承認，弱裔不僅是正要來臨或是「將來的」，而是已經抵達此時此地，而且也構成了「美國」的定義的一部分。所有的弱裔團體皆是美國國族實體的一部分；他們並非只「在黑暗中戲耍」（playing in the dark）（Morrison），也不能只因語言差異，就將他們視為二等的「永遠的異鄉人」（perpetual foreigners）。他們應當獲得全面的公民權，享有應得的權利和義務。這類抗爭最出色的成果之一，就是許多大學成立的族裔研究計畫，以及這些計畫所促成的重要研究。一直以來，以強烈區隔性語彙定義弱裔身份認同的行為雖只是戰略考量，但不幸地卻使部分不被包含在「官方弱裔」範疇內的主體位置遭受忽視。

族裔研究中的「抵達」（arrival）典範必然使國家內部的權力和階序關係成為唯一的關注點。一方面，新移民與道地性（authenticity）及文化國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兩者之間關係十分矛盾，而這兩者卻是最初促成族裔研究發展的重要概念；另一方面，垂直抵抗的模式阻礙了跨族裔連結和跨國弱裔結盟。舉例來說，做族裔研究的學者很少與做法語研究的學者溝通或合作，儘管二者常有許多地理和文化上的相同處。同樣地，族裔研究和區域研究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無法獲得舒緩：雖然泛非洲主義能成為非洲學者及美非學者之間一個有限的對話平台，泛亞洲主義在政治意義上卻十分可疑，也因過度具有威脅性而無法發展為一個慣用的概念。因此，族裔研究一直是美國境內的典範，而區域研究則持續推崇過時的洲際疆域。在國家語言的研究上，很少對語言和國家之間的換喻關係提出質疑。

然而，人口和文化的跨國移動所造成的壓力已讓人開始質疑上述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族裔和區域研究。身為位處族裔和區域

研究之內和之間的學者，我們不僅期待一方的研究問題能為另一方帶來啟發，也希望對 20 世紀跨國議題提出全新提問。本書的編者們共同主持了「加州大學跨國暨跨殖民研究多校研究小組」（Multicampus Research Group on Transnational and Transcoloni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在組織的運作下本書作者們展開對話以及多年的合作，因而成就了這項計劃。如同我們的研究小組，這本書企圖在各類群體之間建立橋樑：這些群體雖在現存制度的限制下必須各自擁護領地，卻關注同樣的議題，也有相通處。而我們的成果已證明：從這樣的「弱裔」觀點檢視跨國主義，不僅對理論思考有所助益，在實際面也能多有收穫。為了理解跨文化及跨領域方法的基本邏輯，這樣的觀點是必要的，也才能對將跨國主義視為一種趨同力量的主流想法提出質疑。

弱裔跨國主義

在過去十年左右，一個新的「跨國研究」領域逐漸浮現。這是受到社會科學界內部流通的跨國理論的助益，而新興的全球化理論，則相對地合理化跨國理論的發展。大體而言，跨國主義被視為最新一波全球化的產物，與全球化有著相同的晚期資本主義的歷史背景，其特色是金融資本的邏輯運作、資本的彈性積累、及後福特主義式的國際勞動分工（Hall 23; Harvey）。在我們的認知裡，全球化的定義必定相對於一套同質且具支配性質的標準，而跨國則標示出讓能動者在其中跨界行動的空間和實踐——可能是主流的也可能是邊緣的。全球化的邏輯同時是向心的也是離心的，並且預設了一個普遍的核心或基準，它不僅由內向外擴散，同時也將異質性的文化形式拉進它的旋渦，以他的基準衡量一切。它在所謂的普遍和特殊之間，生產出一套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階序關係，也相應產生了歐洲中心普遍主義的所有問題。相反

地，跨國則可被視作一個可以看見雜種化（hybridization）過程的交易參與空間；在這裡，不同文化不需透過中心的中介，而得以被生產和演現。

這樣對於跨國的界定是將跨國主義視為全球化過程的一部份，但同時也能看見：跨國相較於全球化有更大的彈性自由、並且更加散亂四佈。爲了展露跨國運作和構成的多樣性，研究者試圖分析其組成要素並追蹤其行跡移動。在一方面，有所謂的「由上而下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 from above），意指跨國公司、金融資本、全球媒體、及其他受精英階層控制的巨型結構的跨國過程（Mahler）。這種「由上而下跨國主義」受烏托邦式全球化觀點（utopic views of globalization）的影響，強調國家邊界或其他邊界的跨越，並頌揚全球自由市場、文化交混、民主政治和普遍人權等。惡烏托邦式全球化觀點（dystopic visions of globalizaion）則強調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譬如對環境及健康的破壞、文化「麥當勞化」、貧富差距的無限擴大、剝削第三世界勞動力、犧牲南半球利益，以增加北半球財富等等；換句話說，即是西方資本主義的霸權及史碧瓦克（Gayatri Spivak）所說「不受限制的全球金融化」（untrammelled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globe）（262）。惡烏托邦觀點組構了一個反抗基點，有人稱之爲「由下而上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即是所有反霸權、拒絕被既有單一民族國家同化的非精英階層活動，也包括「一般人的日常實踐」（everyday practices of ordinary people）（Mahler）。這類「由下而上」的觀點，早期有瑟托（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革命，將每日的平凡事物視爲反抗力量的來源；史考特（James Scott）也將隱藏式腳本（hidden scripts）和平日實踐視爲總是已經具備反抗性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Weapons of the Weak*）。然而，瑟托和史考特所設想的是局部性政治，並未將跨

國納入其構思中的反抗實踐。同樣地，在局部／全球研究裡，局部常被浪漫化，它不一定是純粹的，卻非得是反抗基點不可。已經有人指出，全球化絕非一完整或全面性現象，全球也不必然和局部形成二元對立關係。而真正改變的，卻是國族的組成參數。國族不再必須透過同質性時間和地域化空間定義，而逐漸地被一種暗指在「多樣化時空（無）秩序」〔multiple spatiotemporal (dis)orders〕交會處的跨國性質所改變（Sassen 221）。因此，跨國不受限於局部／全球的二元對立，而能跨越不同且多樣的空間性和時間性，展現在國族性、局部性、或全球性空間之中。

本書企圖將弱裔跨國主義概念化，以多元的方式介入上述各種表述當中。每當採用弱裔或弱裔化的觀點，則必然要對上述表述的重點加以挪移，並進行修正。主流在討論跨國主義和全球化時，總是預設了族裔特殊性和弱裔觀點是受制於主控的跨國主義形式，且能輕易地被同化。我們同意弱裔和離散者必然參與跨國的過程——但它們可能由上而下也可能由下而上，而且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來參與；我們也同意，弱裔和離散者生活在逐漸整合的全球化空間裡，而這個空間由文化、觀念、資本的全球性流通構成，透過傳播、遷移、資本流動的方式整合起來。然而，即使在束縛之下，弱裔和離散族群總能發展出自己的文化實踐和溝通網絡，超越了這些理論的組成要素。在上和下、烏托邦／惡烏托邦、全球／局部的二元模型裡，缺乏的是對弱裔化文化在國界之內及之間創意游移的認知或體認。若過於強調文化實踐的主流反抗形式，往往容易忽略弱裔和離散族群的文化表現性；再者，他們與當代大企業的經濟跨國主義的關係往往是多樣、矛盾、甚或不敬的，他們在這種關係當中的跨國微型實踐也會因上述因素被掩蓋起來。一般的想像中，反抗主流的方式是藉著強調行動和反動來固化社群之間的邊界，而排除其他雖然在經濟上較為不利，卻能更加積極或更有創意地參與跨國的形式。若將反抗基點抽離

出來而將其定義為「由下而上跨國主義」，如此看來似乎存在著兩種形式的跨國主義，而兩者之間關係為對抗且對立；然而事實上，弱裔和主流兩者的跨國是同時發生在一個由不對等權力關係構成的時空結構裡。

我們認為，跨國理論在穩固主流力量和反抗力量的關係的同時，也一直在實踐一種「認可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請見 Taylor; Fraser）。這種二元模型預設了弱裔必然且持續地與主流文化在垂直面上進行對抗或者被同化。傅柯式分析對於權力的毛細孔運作過度強調，更強化了這個垂直模型，使得弱裔之間在水平面的溝通不可復見。因為傳媒的全球性影響及人口遷移的增多，弱裔文化的跨國性質已成想當然爾，而文化之間的相互溝通也持續強化。弱裔文化是跨國現象的一部分，並非是被物化或彼此隔離的文化風俗囊包，被動等待主控力量選擇性地將其納入所謂「全球性」或是「跨國性質」的定義之內。跨國理論家們總是實踐「認可政治」並倡導一個無邊界的世界，但這個無邊界的概念其實只是繼續強化了北／南對立和支配／反抗的文化模型，並防礙我們看到弱裔文化的關鍵力量。

我們關注的是有別於「後國家想像的認同競技場」（arenas of postnational identification）（Joseph 17）的文化橫截面移動。這種文化截面主義包括了弱裔在其文化表現性上與主流之間所有具意義的關係（可能以各種樣貌、形式、或種類出現），也包括弱裔與弱裔之間避開主流的關係網絡。這類文化截面主義也生產出新興的認同形式，能與各種國家、族裔、文化邊界進行對話協商，使弱裔內在的複雜度和多樣性浮現。由此，對新式倫理學的需求愈發急迫，而歸屬感竟出現在令人驚奇意外的地方；新的知識（literacy）在非正統語言及聲調節奏裡被創造出來；殖民空間、後殖民空間、新殖民空間的並存則在根本上打亂了它們原來的時間順序。如此思考弱裔的跨國，有別於從後國家想像、游牧式、

且「彈性」的標準來界定公民權（Appadurai; Joseph; Ong）。後國家想像及游牧式的身份認同已相對地脫離國家或其他邊界的地域性控制，但弱裔的跨國則指明並突顯國家和跨國之間的多重關係。弱裔的跨國能認清弱裔所面臨的困難：民族國家仍然是分配及規範權力、地位、物質的主要機制，但弱裔卻缺乏在國家集權論定義之下的公民權組成要素。彈性或游牧式主體如同自由漂移的意符，對於既定的地理政治空間沒有任何精神上或物質上的寄託。相較之下，所有弱裔的跨國主體則無可避免寄託於各自的地理政治空間上，寄望有一天能被認可為「公民」，以取得全面公民權的相關權利。

後國家想像中預設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隱性界線，如此才能再超越這個界線；但我們所構想的弱裔跨國主義是以格利桑（Edouard Glissant）談論關係的理論做為出發點。對格利桑而言，文化並不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單一實體或劃界空間：這樣的想法是不論在過去或現在均是一種幻覺。他所定義的文化「混語交融化」（creolization），不是指純粹的文化實體在接觸地帶（contact zones）彼此接觸而產生，而是強調文化本來就是從一些出人意料且時而暴力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總是已經交混且相對化的（*Poétique de la relation*）。因此，我們將透過跨國來討論這種本源式的多樣性或混語交融化，以突顯在民族國家界線內外所發生的弱裔構成經驗。雖然跨國企業的出現應該已經消解了民族國家的界線，但民族國家做為控制和主宰的機制依舊十分活躍。弱裔的文化工作者是跨國的，這不是因為他們超越了國家，而是因為他們的文化導向本身就已是格利桑所說的「混語交融化」。比如說，阿敏（Samir Amin）也已經指出近來的全球化理論是多麼虛偽——它們總是暗指所有國家、文化、及語言在過去都是彼此區隔且純粹的實體（*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Eurocentrism*）。安薩爾（Jean-Loup Amselle）由資訊網絡獲得啓

發而發展出「分流」(branchements)理論，也研究弱裔伊斯蘭團體 N'ko；此兩者皆開展了新的方法，讓我們得以在分析文化交流的同時，也能證明「跨陸活動」早在當代定義下的全球化出現之前即已存在。若我們跟隨格利桑、阿敏、安薩爾的腳步，認定混語交融化及混雜本身就是文化的先驗條件，那麼我們便可表明：弱裔的表現度(expressivity)必然是更為混雜化和跨國的。弱裔在民族國家內部的邊緣位置，及他們所經歷的遷移和各種形式的(新)殖民主義經驗，皆使得他們必須在偽裝成獨一無二及原汁原味的主控性文化資源(包括跨國組織所倡導的)之外，尋找其他形式的文化資源。這並不是說，主控性文化資源就一定是獨白式(monological)的，但是主控者針對這些資源所進行的修辭、管理、及調度總是強勢地聲張自身的道地性，並將其權利加以合理化。而對於弱裔而言，道地性便是一個「他者化機器」(othering machine; Suleri)，自古以來阻礙了他們獲取全面公民權的可能；它也是一個機制，促使弱裔以文化國族主義的形式，來產生對道地性的反動概念。

從我們的觀點來看，道地性是一個二叉的問題。它既隱含一種「取回政治」(politics of retrieval)，也是一種「包含／排除政治」(politic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若這種「取回政治」能讓次要團體重拾過去所失去或受壓抑的文化認同，它便能賦予他們力量。但當這種「取回政治」本身即預設了對於恢復已逝純粹性的慾望，那麼它將成爲一個危險的念頭，可能導致極有問題的文化本質主義或是道地性迷思。一旦將道地性喚起或正常化，便會產生一種「包含／排除政治」；武斷而固定的認同範疇將以認同政治的形式出現，並開始管制文化表現和實踐。既有文化弱裔團體內的差異性，將因該團體爲了對抗支配者而組成統一的文化陣線而受到壓抑。然而，既有的弱裔文化其實都是跨遷移及多重邂逅的產物；也就是說，它們一定都總是已經混雜、交混、及

相關的。雖然一直以來，在政治運作上否決這些多樣性是有助益的，但是，策略性操作的「道地性」並非長久之計，因為即使在特定的弱裔團體之內，政治化的焦點也會隨時間而改變。史碧瓦克所說的策略性本質主義絕非意指要僵固不變地主張真理所在。這不是說我們不需要策略性本質主義或道地性政治，而是說，我們必須認知它們在多變脈絡下的運用是有限制的，而且排他性太強，即使對於團體內部的成員也一樣。

今天，在各式各樣的具體或虛擬接觸空間的構成之中，文化連結（conjunctures）和分裂（disjunctures）的速度、頻率、擴展發生得越來越快。因此，重新從跨國或相對化的觀點來思考道地性政治便成為當務之急。在跨國脈絡之下可見的道地性將成為「陌生人拜物」（stranger fetishism）的犧牲品：具道地性的陌生人成為商品，而握有購買力者則控制並消費其差異性（Ahmed）。因此，新興的全球性多元文化主義形成了，而來自各地的陌生人便成為文化購物單上的項目。當各種國族主義（nationalisms）逐漸隨著跨國而衰退，弱裔身份認同的僵固化將越來越醒目，並且與經濟全球化格格不入，也因此成為全球性多元文化現成的消費對象。

在新全球性多元文化主義的構成裡，我們必須重建「弱裔」（minor）或「弱勢族群」（minority）的意涵，才能有別於往昔總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認知模型。當我們並置弱裔與跨國主義時，隨著一系列議題的組合而來的新的意義場域便應運而生了，有別於現存「弱勢族群論述」所帶有的意涵。在美國研究裡「弱裔論述」的出現，是來自將「多樣性」理論化的過程。但是這個思考多樣性的途徑卻仍舊是單語式（monolingual）的，儘管在弱裔社群裡，多語經驗是必然的前提。當我們開始要思考非美國式的跨國主義及跨殖民主義時，從「弱勢族群論述」模型所獲得的協助便十分有限。將世界各地的弱勢族群所弱勢化的，並不見得

是同樣的機制；根本沒有所謂的普遍性弱勢位置。若觀察在其他國家或地區脈絡下成形的弱勢議題，則似乎可以看出所有的表現性論述（譬如音樂、電影、自傳、及其他文類）皆受其跨國及跨殖民過程的影響。在此，跨殖民主義暗指的是一個既屬於殖民主義，也屬於新殖民主義的經驗（在相同或不同的殖民者之下）——雖然兩者的經驗必是相異的；這是創傷之地，是跨國的黑暗面。

許多歐洲國家如英國、法國、葡萄牙、西班牙，亞洲國家如中國和日本，及美國等，都在歷史上經歷過殖民與帝國統治。因此，它們的文化、文學、及語言也都穿越了國界，傳到其他民族及國家之處。雖然後殖民研究在殖民文化的探索方面為一利器，但自去殖民化以來的社會文化發展，卻逼促我們必須透過跨殖民的觀點，來加強研究的脈絡化。舉例來說，後殖民性的概念所關注的是自獨立以後的歷史，這其實是不足的。它的關懷停留在主控（殖民文化）及被控（被殖民文化）空間的相關性，而對於那些實際上還被殖民的文化，或那些已屈服於全球化、多國資本、及相隨而來文化市場的殖民力量的文化而言，則無法提供適當的研究架構。更重要的是，後殖民研究無法突顯弱裔在其跨殖民及跨國經驗當中所獲得的豐碩文化成果。後殖民文化研究一直過度關注在一個民族國家範疇之內的垂直分析——像是英國殖民主義在印度所造成的影響，而研究的主要對象則常是殖民者及被殖民者之間的垂直權力關係。最後，它也再度強化了英語做為論述溝通語言的文化霸權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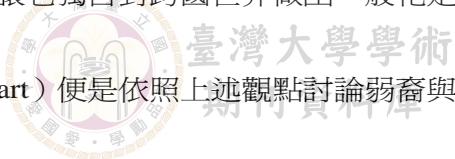
對比之下，我們不僅能認知殖民權力關係的持續性及全球資本的力量，也注意到弱裔表現性文化（*expressive cultures*）在多樣語域裡的內在複雜性。我們採用水平方法，穿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界線，而以富有成效的方式來進行後殖民弱裔文化構成之間的比較；同時，我們也討論多樣語言的構成。以此書而言，這在方法論上意味著要在多樣的層面上進行對話，並牽涉到穿越國界

及族裔／區域研究界線的理論、歷史、空間性、文化、及學科的問題。在美國族裔研究及區域研究方面，以國家為基礎的研究將與傳統他者（如歐洲研究及「理論」的研究）彼此碰撞，並產生火花。比方說，若族裔上的美國主體性已不在原地且已被視為具有全球性意義時，我們該如何將它理論化？當國家主體（在出身之地）及族裔主體（在定居之地）兩者已能彼此滲透互動、或說互為主體時，我們該怎麼想像在移民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主體，前者是如何過渡到後者的？移民主體是否在定義上就是後現代的？若既有理論本身即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弱勢族群」與「理論」兩者如何能夠彼此影響？那麼，我們又該如何將理論「地域化」（provincialize）——用查克拉巴迪（Chakrabarty）的話來說——好讓普遍性的理論回到它們的脈絡，並揭露它們的特殊性？

轉化性實踐

在此，**理論、歷史、操演、空間性、文化、及學科**皆是行動語彙，能由不具道地性的能動主體，也就是那些被視為「沒有歷史」也「沒有理論」的人，以非傳統慣用方式來運用。所謂「理論化」是一種挑戰歐洲中心主義理論普遍性主張的實踐；而它也不預設真實能被透明地再現，所以不致於演變成爲過於天真的經驗主義及記實性質（documentarity）。在這樣定義下的理論，總是已經暗示弱裔化主體的存在，即使這樣的暗示常只是被忽視、誤認、及否認。此處的他者便是理論中的自我（self）的構成份子；他者總是缺席，但它的缺席也時時刻刻在呼喚著它的出現和抵達。如此，我們便是要以此多樣的方式來討論理論——包括要批判、重寫、及發明它；絕不讓它獨占對跨國世界做出一般化定論的權力。

及爾哈特（Suzanne Gearhart）便是依照上述觀點討論弱裔與



跨國的交會，並在理論化的過程中勾勒出巴利巴（Etienne Balibar）所謂的「內在排他性」（interior exclusion）概念。弱裔作為內在排他性之客體是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在定義國家及公民權時實為不可或缺。當所謂的歐洲自我（European self）對於弱裔他者進行排他活動時，他也同時與他者處在一個「跨個人」或互為主體、內於主體的關係裡面；正如同主體化過程中，主體必須從內部將自我推斥而出一樣。這是一個雙重的過程，而認同（identification）在國家公民權及歸屬感定義之下的曖昧性便是由此產生。同樣地，在跨國的過程裡，移民者及弱勢族群都是既相異又相同、既排他又內括，而跨國便與他們處在這樣一個雙重關係當中。因此，他們正是跨國的基本組成分子，而這裡的跨國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可能是「由下而上跨國主義」也可能是「由上而下跨國主義」。

在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之間的遷移旅行現象，讓弱裔做為跨國形構過程的組成分子的特質慢慢浮現。主流的西方旅人身處遙遠（或其實沒那麼遙遠）的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地點，已有許多相關的評論文章，描繪出其殖民、後殖民、及新殖民軌道（trajectories）或路徑（routes）（Clifford; Kaplan）；然而，卻少有論者討論他者的多向旅行，除非是以移民研究的方式，認為移民者只有在進入西方世界之後，才能獲得主體性——而且還是一個有待商榷（problematic）的主體性。除此之外，論者也分類出第三世界都會人及彈性公民（Ong）等，強調其漂移於國家界定的經濟、政治、文化、及公民權之上的能力。但是，如果他者的旅行和移動並不被包括在這些分類之下，那又該怎麼辦呢？

舉例來說：當非白人的西方人橫越全球化的力量，來到非西方世界時；或者，當非白人的非西方人來到西方世界，但並無成為移民意圖，也沒有能力成為第三世界都會人或彈性公民時——如此，曖昧的主體位置便產生了。全球化之後，許多他者找到

了家的所在之處，但同時，也有許多他者去到了異地。另類的跨國環行便由此產生，但卻從未被理論化。在此書中，劉大衛 (David Palumbo-Liu) 與史書美 (Shu-mei Shih) 的文章，便針對在跨國脈絡之下的倫理學提問：無論是虛擬的或是面對面，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接觸往來，都已激增到前所未見的程度。自我對於他者有哪些責任？這些責任該如何被表現、具體化、承擔、或是履行？而他者是否也有責任？

劉的論點設立在全球化脈絡裡互為主體情感 (intersubjective affect) 的跨太平洋流通之上，文章的一開始，劉先對理性選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 及美國實用主義 (American pragmatism) 兩個看似無關的論述進行批判，他認為它們皆奉行「自我利益及排他性的邏輯」。在這樣的脈絡裡，文學的角色及功能是什麼？在今天，文學是否可能生產出具倫理學作用的情感 (ethical affect)，以對抗全球經濟及媒體的去人性化力量？當感性 (sentimentality) 絲毫不在理性選擇理論的考慮之內，而又被實用主義所操弄時，文學該如何處理它？在此做為典範的文本將是日裔美籍作家尾關 (Ruth Ozeki) 所著的一本小說《食肉之年》 (*My Year of Meats*)。雖然此書可被稱為後現代小說，卻殘留了現代性的要素：它為資訊提供了倫理學脈絡，並想像出一些可能存在的社群 (雖然在空間上及時間上，這些社群是不連續的，例如網際網路或傳真通信的社群)。在這本小說中，尾關也不害怕施展運用感性，反而將其視為手段，有利於表現或再現對於他者的關心。在此，美國境內所謂的被種族化他者——也就是書中的日裔主角，則具有象徵作用。除了象徵西方人的自我，也象徵其對非西方世界的責任，包括對美國境內其他種族弱裔的責任。

當所謂第三世界土生土長的他者，能克服國族主義與本土主義 (nativism) 所帶來的反動情感，而脫離認同政治的二元邏輯，那麼，具倫理學作用的情感也可能從非西方世界開始流通。史分

析了東方主義（Orientalism）與反東方主義兩種論述當中的二元主義束縛，並討論西方世界抑制文化共時性（coevality）的行為，及他者爭取並堅持文化共時性的努力。前者，是西方自由主義藉其貧乏的想像力來表現他者的方式；而後者則是他者對此想像力的曖昧順從。他者的順從，在文化國族主義及本土主義的論述當中最顯而易見：譬如，要反抗並駁斥東方主義，包括其不公義的整體化論述及其抑制文化同期性的行為。對於中國的華人而言，其中最重要的表現之一便是深植人心的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中國中心主義在意圖強力對抗西方世界過程中所遭受的挫折，常轉移到其內部或外部的他者：如中國境內的種族弱裔，或是中國境外「不具道地性」的華裔民族。史認為，中國大陸所擔負的倫理學責任，其中一部分便是要擺脫其對於西方文化霸權反動的中國中心主義；正如西方世界也應擺脫其跋扈的作為，並不再任意操弄相異／相同的論述一樣。她以女性主義橫越中國／西方分界的協商溝通做為例子，並說明這個分界早已被移民、旅行、及離散經驗複雜化，所以至少已是一個具備三個部分的建構。她將列維納、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及李小江（Li Xiaojiang）的想法綜合起來，提出一個在橫截面上的可置換政治（transversal and transpositional politics）；在此倫理學的意思是，要能超越第一世界文化霸權及第三世界國族主義的二元邏輯，並將自己的位置置換為他者的位置，甚至是更多的其他他者的位置。

同樣地，寇奚（Susan Koshy）也對於西方全球化理論所設想的普遍主義提出質疑。寇奚指出，普遍主義一直將第三世界視為理論的接收者，刻意掏空了第三世界領導者的能力，而忽略他們其實也是建立全球秩序的合著者——她巧妙地將這種能力稱為「轉化性動力」（transformative agency）。為了能更正確地反應第三世界在全球化裡扮演的角色，寇奚提出「永續普遍主義」

(sustainable universalism) 的概念。對她而言，弱裔跨國是一些即將冒現的非規範性權力體制 (nonnormative regimes) 及「實用人文主義」(practical humanism) 成形的基地；它為「眾多運動、團體、論述的彙集」提供框架，讓它們能以游擊戰的方式來對抗主流跨國及「跨國社群」的網絡。舉例來說，國家及國際的法律權力體制皆無力監控跨國性的性奴隸 (sex slaves) 非法交易，而這個法律漏洞則由弱裔的跨國性組織填補起來。這是因為，弱裔的跨國性組織所奉行的各種實用且永續的普遍主義，較能再現後現代底層 (postmodern subaltern) ——即性奴隸——的特殊脈絡或跨脈絡情形。

有關弱裔主體及其歷史的學術知識，皆是在學科劃分的原則之下被生產出來。因此，對於要重新思考跨國的族裔及遷徙關係的工作而言，如何重新考慮學科的劃分也同樣重要。透過將弱裔論述的生產場域「歷史化」，我們得以呈現，跨學科的學術實踐究竟如何將跨國知識的對象建構出來。由此，也可以轉化原有的詮釋體系及學科習慣，並生產出另類的系譜學 (genealogies) 及過去敘事 (narratives of the past)。

司托維爾 (Tyler Stovall) 的文章則採用歷史性的批判實踐，來進行從弱裔出發的跨國評論。他用一個領域的見解，為其他領域的問題帶來啟發，以彰顯傳統的學科典範在理解 1926 年 Crutcher 謀殺案上的不足。他採用法裔、法語、及美非研究的觀點，透過後殖民及文化研究的途徑，試圖理解這個發生在巴黎的謀殺案——一個法裔的白人女性謀殺了她的美裔黑人丈夫。司托維爾的歷史分析顯示出非白人主體抵達大都會後，對其階級、種族、性、性別、及暴力的動力帶來改變，並突顯出法國 1920 「瘋狂年代」(années folles) 所發展出來新的權力關係及「斷層帶」(fault lines)。他讓我們得知，在分析這個案例時必須採用「三個不同的地理及理論觀點」，方能全面性理解它；Crutcher

案可視為「後殖民犯罪」(postcolonial criminality)的實例，必須放在都會、殖民、及美國脈絡之下來理解。他所進行的文化史分析既是跨國的也是跨脈絡的，讓他得以展現出，兩戰期間的法國已經逐漸發展出「美國式模式的種族關係」。這樣的解讀結果，證明了當代法國所面臨的種族及多元文化主義問題，其實有著比一般所了解更淵遠的系譜學。

麥克修(Kathleen McHugh)也用類似的方式，將理論、歷史、及地理問題放在一起討論，以表現弱裔的電影工作者是如何消解主流的敘事及電影傳統手法——這些傳統手法總是意圖捕捉深植於國族空間及歷史時間的一致性自我(coherent selves)的「真實性」。麥克修讓我們看到，美國的「族裔」電影工作者是如何將「跨國弱裔經驗內在具有的代表性——隱無(absence)及不可見性(invisibility)」展示出來。日裔美籍田尻(Rea Tajiri)的《歷史與記憶》(*History and Memory*)，便是透過「歷史性的視覺再現」，為這種隱無留下記錄；而墨裔美籍奇哥那(Chicano)藝術家樸愛塔(Ramiro Puerta)及維達奇雅(Guillermo Verdecchia)的電影《遊艇／十字路口》(*Crucero/Crossroads*)，則透過空間的運用，意圖「打斷主體的一致性」。這些在電影製作及敘事上的實驗性手法所產生的影像，呈現出跨國弱裔經驗的「邊緣主體」(border subjects)常具有的破碎意識(fragmented consciousness)；對於他們而言，私人及公眾、個人及歷史、真實及虛構等，皆是交纏不清的。麥克修的細微分析，突顯了弱裔經驗是如何在生活中實踐理論，而這些理論正是應所謂後現代的隱無及不連貫性(incoherence)敘事而發展出來的。但她指出，透過種族化身體的視覺再現，此處的隱無則被賦予現存性(presence)、過去、及可能的未來。這些影像能揭露「民族和國家的裂縫及無力，展現於跨國弱裔主體的身體之上」的無數方法。然而，這些再現影像並非以反抗的方式或本質主義的手法，

將弱裔身體視為連貫或同質性的實體；相反地，在其電影實踐當中，電影工作者皆遵照破碎的邏輯（a logic of the fragment），藉此突顯「邊緣」主體總是已經不連續，而以多重編碼進行認同形式。

弱裔身體是重要的：他們（在種族、性上的）可見的差異已在各種論述裡被工具化了。身體是許多有關自我的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辯論的中心。而語言和身體及身體的外觀一樣，也是身份認同及民族性的指標。但是，在非洲的每個人都是多語的，所以對於語言及身份認同的單向式途徑便不再可行。阿德鍾莫比（Moradewun Adejunmobi）分別考察在法國及英國殖民政策的同化、間接統治之下，有關語言及識字能力的討論。她認為部分的反殖民作家及評論者在討論語言議題時，用的是與殖民者提倡方言識字能力時「相同的修辭」：如「異化」、「尊重過去」、及以各自的語言「與每個社群對話」等。她描述了殖民或「主流」論述在討論方言時，所使用的地域性邏輯（territorial logic）；它們總是將方言視為控制或區隔不同語言社群的藉口——這些語言社群彼此的差異其實是在這個過程中被建構出來的。阿德鍾莫比對方言做為純然本土文化空間的反抗性地位提出質疑，同時也藉此將「弱裔」的語言選擇政治中最常聽的幾種陳腔濫調去神秘化。方言並不自動存在，也不是一個未受污染的場域；更確切地說，它要不是被當作殖民官僚控制系統的工具，就是爭取政治上自主的手段之一。對於多數的非裔作家而言，方言幾乎從未是目的；他們的視野已超越歐洲語言及母語的二元對立，而對於跨文化溝通之下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概念更有興趣。因此，在非洲的語言使用似乎可視為弱裔跨國主義真實體現（de facto）的有趣案例：重疊及多重認同的社群之間連結了起來，而它們較重視的是彼此之間的橫向文化聯結，而不是以堅稱其純然的族裔特性，來對抗主流經濟全球力量的跨國形式。



在本書〈閱讀、書寫、操演〉（“Reading, Writing, Performing”）此一部份裡，李歐旻（Françoise Lionnett）為印度洋—非洲地帶的方言使用，提供了新的觀點。她關注於討論維拉沙米（Dev Virahsawmy）的作品：這位有名的模里西斯（Mauritian）劇作家激進地改寫及重新詮釋了許多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戲劇。李歐旻認為，要理解維拉沙米的《風暴》（*Toufann*）一劇最好的方式，不只是一要相對於其顯性的互文——即莎士比亞的原作《暴風雨》（*The Tempest*），而是要將其視為一種對權力的跨殖民批判，就像是阿契貝（Chinua Achebe）及坦西（Sony Labou Tansi）等撒哈拉沙漠以南（sub-Saharan）¹ 非洲作家的作品一樣。此劇的英譯版在 1999 年於倫敦上演時相當成功，突顯了對於「弱裔」文化文本的接受裡的內在矛盾。《風暴》對於知識、控制、及權力政治等雖有著深刻的反省，但在越洋回到大都會的過程裡，其原本在批判及性上的尖銳度已消磨鈍化，淪落成老掉牙的批判典範眾多的「文化」表現之一，不再是針對這些典範的尖銳批評。

巴戴德（Ali Behdad）所稱「閱讀『弱裔』文學的困境」，突顯了語言、文學、及後殖民詮釋閱讀等問題。在此類文學被制度化的過程裡，有什麼樣的風險？弱裔文學裡的流亡、流動性、隱喻式流離（displacement）vs. 真實的流離等主題，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創造出一個論述場域，讓無家可歸的狀態和僅根植於語言的自由漂移主體性的好處變得理想化？而後殖民知識份子對於此類文學的烏托邦式情懷，使得他們在看待「地理流離的誘惑力量」往往抱持著浪漫的觀點。巴戴德透過對其批判方法的自我反省，分析阿爾及利亞作家什拉伊比（Driss Chraïbi）出版於 1955 年的小說《山羊》（*Les boucs*）；巴戴德得對這部後戰時期法國

¹ [譯註] 非洲最窮的幾個國家皆位於此。



馬格里布 (Maghrebian) 移民者命運小說的討論使我們得知，若要徹底理解這本小說裡流亡和移民的真實情況及其脈絡，所有在社會、經濟、政治、和歷史上的脈絡化皆非常重要。

正如巴戴德指出，我們可在後殖民理論對於流離的美學化裡，看到跨國性質的烏托邦面向，並可將精英、離散知識份子的跨國主義，解讀為一種由上而下跨國主義。布爾達 (Michael Bourdagh) 的文章便試圖處理一種看似縹渺虛幻的跨國形式——乘坐噴射機環遊世界的流行音樂家在兩個大都會之間的移動。然而，布爾達對於坂本久 (Sakamoto Kyū) 的「鄉村搖滾譯介」 (translations of rockabilly) 的解讀，同時也指出非西方表演者及藝術家在美國脈絡之下，在流動性和可譯性兩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坂本久雖非美國境內的「弱勢族群」，他的音樂卻在文化上及種族上被轉化，以表現所謂的「日本性」 (Japaneseness)。強加於他的創作之上的英文歌名〈壽喜燒〉² (“Sukiyaki”) 具有在料理上可以普遍被理解的絃外之音，使其成為國際性通用語的一部分，卻也因此弱化了坂本久在日本原來的主流聲音。而在翻譯過程中產生的許多差異和階序，更使之從主流形式轉移到弱裔形式的旅程顯得困難重重。而這位身為日本流行歌手的旅者在一次空難中過世，來不及在好萊塢星光大道上留名。布爾達的批判實踐也讓我們看到，「弱裔」跨國的論述之間的理論借用是富有成效的。的確，布爾達在談論鄉村搖滾時的觀點，正取自《黑色大西洋》理論家吉爾若依 (Paul Gilroy) 談論黑人音樂的理論。

當我們討論全球化、移民、跨國流動等問題時，總是傾向將全球化與都市的 (urban) 混為一談，並認為世界上的農村地區皆存在現代性和全球化之外。在本書的最後一部分〈空間化〉 (“Spatializing”) 裡，夏普 (Jenny Sharpe) 的文章帶我們來到牙

² [譯註] 中文譯名較符合其日文原名，為〈昂首前行〉。



買加 (Jamaica) 的農村，以另一種方式借用吉爾若依的理論，並且提醒我們，舊有的殖民剝削典範依然持續存在，而且「城市及鄉村之間的距離因此越來越大」。在鄉村，黑人女性的主體性及中介性，其真正的所在地以及象徵物不是網際空間，而是電台廣播。若主流的全球跨國形式總是相對應於一個都市空間組成的虛擬網絡，那麼在牙買加，舞廳文化、電台廣播、及 dub 詩，³ 便是強而有力的「弱裔」全球化形式；透過它們，鄉村女性得以表現其自身的物質文化，並獲悉全國性及國際性的新聞——新聞中的日常生活的奮鬥，常與她們景況相呼應。因此，布里茲 (Jean Binta Breeze) 的 dub 詩能「讓無名女性的臉浮現出來，否則她們會在我們繪製跨國文化及全球化地圖的過程中，隱然不見」。夏普提醒了我們，在音樂上及全球化上其實有許多弱裔的基調和形式，而在女性的操演裡它們則可被看見和聽見。

若主流的跨國主義總要誇耀空間的極度壓縮，或是距離的徹底消滅，那麼，弱裔的跨國主義便是要描繪出一個更為複雜的空間結構及異質性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s)——借用列斐弗爾 (Henri Lefebvre) 的概念。這些實踐在邊緣或邊界等「非空間」裡進行——它們其實是無限的、充滿可能性的空間。利比特 (Seiji Lippit) 的文章討論的是國族文化矛盾地將弱裔文化同時視為棄卻 (abjection) 以及收併 (incorporation) 的場所，以呈現其概念上的侷限性。他思索的是一種具裡面 (inside) 和外面 (outside) 的特殊形式——如同洛德曼 (Yuri Lotman) 的「符號域界」(semiosphere) 概念當中，裡面和外面兩的邊界既有區隔作用也有整合作用。這類的邊界空間之一便是小說家中上健次 (Nagakami Kenji) 所使用的 roji 一詞，⁴ 用來指稱日本主體流連

³ [校稿註] 七零年代起源於牙買加的即興創作詩，搭配上雷鬼樂的旋律，內容以社會正義及政治批判為主。

⁴ [譯註] 在語意上是巷弄、巷道的意思。



於其內外的賤民村。這類空間與其他具「道地性」的國族空間有著內在矛盾的關係，既在其外面（被排他和棄卻）也在其裡面（被同化和收併），同樣的，弱裔文化也與國族文化有著內在矛盾的關係。在國族的想像裡，被棄卻者隨時「可能變成神聖的」，因此 roji 才具有「奇妙的力量」，讓中上健次等作家為之著迷。

以同樣的觀點，馬爾嵌特（Elizabeth Marchant）的文章則討論一個具體歷史地點——佩洛里奧（Pelourinho），又稱「黑色羅馬」，是薩爾瓦多（Salvador）的歷史重鎮，並由此考察巴依亞黑人（Afro-Bahians）巴西國族文化中既是邊緣又是中心的情況。在這種意義上，馬爾嵌特所談的佩洛里奧便是利比特所談的 roji；後者的「棄卻」呼應了前者的「支配」（subjection），因為佩洛里奧正是黑人苦難及暴力的場所。然而，馬爾嵌特更進一步地揭露，巴西政府為了宣傳該地的觀光，而必須提出種族民主、和諧的浪漫說法，以及宣揚黑人文化。但這種將黑人文化浪漫化的定價措施（valorization）並無法改變黑人的階級地位，而只是物化了其族裔性及文化。此定價措施不在社會經濟層面上發生；文化被抽離其脈絡，為的是承載巴西國族文化定義的修辭，在其中包括了種族民主及文化混合。馬爾嵌特的文章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視野，讓我們得知當「弱裔」空間被挪用以成就「主流」目的時，其內在所包覆的多重意義；同時，這個空間在歷史及國族上所代表的邊緣性也遭受質疑。

奇哥那／娜（Chicano/a）將阿茲特蘭（Aztlán）建構成具有神話性質的家園，形成一個具備對抗性及另類性的地理空間，以有別於美國的土地分配——這也同樣對於規範性公民權構成挑戰。斐瑞－托魯斯（Rafael Perez-Torres）以激進的態度面對混絲



絞股（mestizaje）⁵ 及裂縫性（interstitiality）兩個概念，在邊境的跨國空間裡對其進行評估。儘管部分評論者傾向於將邊界地帶（borderland）及混絲絞股等比喻浪漫化，斐瑞－托魯斯仍意圖證明它們最終不會成為拜物的對象。他認為，對於奇哥那／娜藝術家、詩人、及學者而言，混絲絞股這個比喻既帶給他們力量又使他們憂鬱；它既是反諷的也是歧義的。歷史上的位置錯亂（historical dislocations）既產生了意識形態的斷裂，同時也將個別主體鑲嵌在其所受限的社會關係的物質條件之上。因此，奇哥那表現性文化裡家園的神話性空間，便能持續地形塑出個別的成果，讓反殖民的勝利感和憂鬱感持續交纏，並同時表現出其賦體主體性（embodied subjectivity）的獲得和失去。如此，斐瑞－托魯斯的文章能突顯出美國族裔研究裡一個重要面向：奇哥那／娜有別於亞裔或非裔，因為他們所占據的空間是曖昧的。後者的歷史（不論是移民或是奴隸制）皆是流離的歷史，但奇哥那／娜的跨國並非因其從一個國族脈絡移到另一個國族脈絡，而是由美國西南部國境更迭的歷史事實所造成。斐瑞－托魯斯認為奇哥那／娜藝術參與了美國西南部的空間的社會生產（social production of space），而且對於「既定的美國身份認同……其前提為排除族裔以維護國族」構成挑戰。這一點非常重要，而我們也認為它能為這本談論「弱裔」跨國相遇（encounters）的書，增添一個特殊的角度。在此存在有別於非裔（如阿德鍾莫比所談）或模里西斯（如李歐旎所談）脈絡底下的特性，呈現出一種有趣的混絲絞股形式。雖然在此無法深究，但這種有趣的形式能與許多地理性及政治性議題之間，進行有意義的對比。比如說，法國及西班牙境內的巴斯克人（Basque）在其跨界的多語性文化身份認同及多樣的

⁵ [譯註] 在此使用洪敏秀的翻譯；詳見洪敏秀〈尋找媒地絲的混絲絞股：柯樂藤《尋找四月雨樹》中的移位介／界面〉，《中外文學》第34卷第9期，2006年2月。



歧義實踐裡，所面臨的各項議題等。

在當代跨國的條件之下，認同及文化上不斷改變且擾人的地域分野不僅切合上述的特定物質情勢，同時也與邊界上的作家和藝術家以敏銳的感受性所協商溝通出來的精神上認同（*psychic identifications*）產生呼應。在音樂的意義上，或許邊界這樣的憂鬱基調是最能與「弱裔」音調（“*minor*” *key*）產生共鳴的。若音樂上的小調（*minor key*）有別於大調的狂喜，是內省且悲切的，那麼，或許「弱裔跨國主義」便是一個調式，讓殖民、帝國、及全球化文化霸權的創傷（*trauma*）以及跨殖民凝聚力（*solidarities*）的情感層面，能獲得抒解，並產生新的可能性。而在懷舊和憂鬱之後，這些凝聚力也能主動地參與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s*）和全球性文化的生產，以提供更多的方式來面對現在及未來對於轉化（*transformation*）的期待。跨越邊界的友誼、合作、及學術研究的成果，具有多樣而活潑的可能性；在此，我們以此書做為見證及範例。

引用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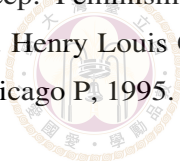
- Ahmed, Sara. *Strange Encounters: Embodied Others in Post-Coloni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00.
- Amin, Samir.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Manage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Zed, 1997.
- . *Eurocentricism*. Trans. Russell Moo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89.
- Amselle, Jean-Loup. *Branchements: Anthropologie de l'universalité des cultures*. Paris: Flammarion, 2001.
- Appadurai, Arju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6.



- Chakrabarty, Dipesh.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0.
- Clifford, James.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7.
- De Certeau, Michel.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2 vols.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1980. Trans. by Steven Rendall as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4.
-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Kafka: 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5. Trans. by Dana Polan as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Forward by Réda Bensmaïa.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6.
- Derrida, Jacques.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67. Trans.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s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76.
- Fanon, Frantz.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Preface by Jean-Paul Sartre. Paris: Maspéro, 1961. Trans. by Constance Farrington as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1965. Trans. and foreword by Richard Philcox as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forthcoming.
- .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52. Trans. by Charles Lam Markham as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1967.
- Fraser, Nancy. "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 Dilemmas of Justice in a 'Post-Socialist' Age." *Theorizing Multiculturalism: A Guide to the Current Debate*. Ed. Cynthia Willet. Oxford: Blackwell, 1998. 19-49.
- Glissant, Edouard. *Le discours antillais*. Paris: Seuil, 1981. Trans. and intro. by J. Michael Dash as *Caribbean Discourse*:



- Selected Essays*. Charlottesville: UP of Virginia, 1989.
- . *Poétique de la relation*. Paris: Gallimard, 1990. Trans. by Betsy Wing as *Poetics of Relation*.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97.
- Hall, Stuart.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Globalization and Ethnicity.”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Ed. Anthony King.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7. 19-39.
-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89.
- Levinas, Emmanuel. *Entre nous: Essais sur le penser-à-l'autre*.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91. Trans. by Michael B. Smith and Barbara Harshav as *Entre nous: On Thinking-of-the-Other*.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8.
- Joseph, May. *Nomadic Identities: The Performance of Citizenship*.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9.
- Kaplan, Caren. *Questions of Travel: Postmodern Discourses of Displacement*. Durham: Duke UP, 1996.
- Mahler, Sarah J.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toward a Research Agenda for Transnationalism.” *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 Ed. Michael Peter Smith and Luis Eduardo Guarnizo. London: Transaction, 1998. 64-100.
- Morrison, Toni.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2.
- Ong, Aihwa.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P, 1999.
- Suleri, Sara. “Woman Skin Deep: Femin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Condition.” *Identities*. Ed. Henry Louis Gates Jr. and Anthony Appiah.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5. 133-46.



- Sassen, Saskia. "Spatialities and Temporalities of the Global: Elements for a Theorization." *Public Culture* 12.1 (2000): 215-32.
- Scott, James.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P, 1990.
- .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P, 1985.
- Spivak, Gayatri. "Diasporas Old and New: Women in the Transnational World." *Textual Practice* 10.2 (1996): 245-69.
- Taylor, Charles, and Amy Gutman.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An Essay*.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2.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